

前 言

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一项促进祖国大团结、大统一，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并惠及后代的重要工作。几年来，我们把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作为自己的工作方向和指导思想，向县内外各界爱国人士征集了一批文稿。我们考虑到文史资料是各界人士自己把亲历、亲见、亲闻的史实整理出来的口述史料。由于种种原因，难免有若干局限。为了贯彻“存真”和“实事求是”的方针，把史料搞真实，特分批印发《桐城文史资料选辑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，广泛征求意见，力求做到内容属实、史料可信。

☆

☆

☆

施 从 云

施从云，字燮卿，1880年4月25日（清光绪六年三月十七日）生于安徽桐城县。少时入私塾读书，勤勉好学，受王阳明学说的影响，喜读有关鸦片战争、太平天国等反帝反满的书籍。

1900年，施经同乡介绍，参加天津镇台吴化纯的部队。后入保定将弁学堂，1904年毕业后，在北洋第五镇中先任排长，继升任队官。1905年春，他回家安葬母亲，曾誓言：“从此双亲归净土，头颅便可造山河！”他剃去辫发，决心投入推翻满清封建王朝的斗争。由于他从军以后，多与思想进步的官兵交游，逐渐成为第五镇中的活跃人物。他与王金铭、冯玉祥等结为深交，联合六名下

级军官，于1910年春发起组织“武学研究会”，以读书研究军事为名，秘密鼓吹革命，互相传阅《嘉定屠城记》、《扬州十日记》等反满书籍。施从云经常向官兵宣传满清王朝屠杀汉人的残酷情景，闻者声泪俱下，怒不可遏。经过施从云等人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，“武学研究会”的组织发展很快，许多士兵纷纷加入。

9月，第二十镇成立，施从云被编入该镇，由队官提升为第七十九标第一营官带。施与营副王金铭等继续在二十镇士兵中发展武学研究会的成员，广泛开展活动，在二十镇里的秘密同盟会员也参加该会活动。接着一部分下级军官也陆续入会，王化东所训练的学兵一千五百余人则几乎全部加入了。武学研究会的活动日益扩大，被二十镇的反动将领潘桧楹等人所察觉，受到他们的疑忌和监视。正在这时，同盟会员在东北秘密组织“山东同乡会”以联络同志，于是由山东籍的王金铭、孙谏声等发起在二十镇组织山东同乡会，聘潘桧楹为会长以遮人耳目，王金铭为副会长实际负责。施从云虽非鲁籍，但为便于开展革命活动，被吸收为“名誉会员”，担任会外干事，实际上成为该会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的重要成员，广泛开展革命活动。

1911年秋，第二十镇奉命入关参加永平（今河北卢龙）秋操，10月10日行军到昌黎，武昌起义爆发，清廷电令秋操停止，二十镇暂驻滦州待命，继而下令调该镇赴武汉前线攻打民军。施从云、王金铭、冯玉祥等人力劝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率部起义，进攻北京推翻满清王朝。张不敢采纳他们的意见，但又不愿到武汉攻打民军，决定拒绝受命，在滦州按兵不动。11月6日清廷下令撤掉张绍曾第二十镇统制的职务，由潘桧楹接任，给张一宣抚大臣并赏加侍郎衔的空名，削去了他的兵权。清廷的倒行逆施，更加激起了第二十

镇革命官兵的愤怒，施从云与王金铭等在滦州文庙召开七十多人参加的紧急会议，挽留张绍曾。施从云等力劝张绍曾说：“君主立宪并非我们的最后目的，为解救国家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，只有革命一条道路。武昌首义后，全国革命胜利，指日可期，不必再有所顾虑。”请张率部起义，进攻北京。张以吴禄贞已经遇害，自己的力量单薄，借口养病，避居天津。

潘家楹接任第二十镇统制以后，奉袁世凯之命，把全镇部队拆散分驻于葫芦岛、连山、秦皇岛、海阳镇、锦州、临榆等地，并严密监视，滦州只留驻第七十九标。为了冲破敌人设置的障碍而继续开展革命活动，张之江、鹿钟麟、石勒亨、周文海、李滋懋等人共同推举王金铭、施从云、冯玉祥等出来主持革命工作。他们三人毅然任之，召集革命同志开会，施从云说：“国事本非一人所能独任，亦不能以一人之不留，将国事遽行停顿，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况革命事业，须以牺牲精神与恶劣环境奋斗。我辈军人，尤应本此主义，地狱当前，我请先入，拿破仑字典无难字，我亦云然。同志相处，匪依朝夕，愿共以铁肩担当革命，竟厥全功。”他们决定加紧积蓄革命力量，积极准备武装起义。王、施与到滦州来运动新军起义的天津革命组织“共和会”取得了联系，与共和会会长白毓昆及凌铎、王葆真、孙谏声、熊朝霖、陈涛、邱子久等人密切合作，共策进行。12月下旬，他们研究决定由王金铭潜赴海阳镇，与第八十标第三营官冯玉祥等秘密商议武装起义的具体计划。

当王金铭从海阳镇返回滦州时，白毓昆已携带了“中华民国政府北军大都督之印”，率领二十多个敢死队员，从天津来到滦州，积极发动武装起义。12月30日，施、王、白等在北关师范学堂召开军事会议，决定立即发动武装起义，并拟推举第七十九标标统岳光

麟为北军大都督，以造声势。散会以后，施从云与王金铭去见岳兆麟，告以推举他为大都督之事，岳借口兵力单薄推辞；施、王为了争取岳，进一步把去海洋镇与冯玉祥密商起义的计划也告诉了他。当天晚上，他们即以陆军混成四十协官长目兵的名义，由王金铭、施从云、冯玉祥等署名，发出主张共和的通电。

岳兆麟是一个反对革命的反动军官，他于第二天早晨逃往开平，向通永镇守使王怀庆告密。王奉袁世凯之命，即于第三天（1912年1月1日）赶到滦州。他本想施用恐吓的手段，以达到“顺机消弭”的目的，不料却被起义军监视起来了，当晚，凌钺、张振甲率领武装官兵到王怀庆住的地方——车站旅馆福德恒楼，逼他起义担任北军大都督。王假装接受，暗中却与第七十九标第三营管带张建功勾结，于1月2日早晨，在入滦州城的途中逃走了。

王怀庆逃走以后，王金铭、施从云等立即召开紧急会议，推举王金铭为“中华民国军政府北军大都督”，张建功为副都督，施从云为总司令，当天宣誓就职，在滦州城里张贴独立布告，并向全国发出通电，发表对内对外宣言及各种文告，阐明了军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。当时天津八国领事团也推代表到滦州来与军政府谈判，承认滦州起义军为交战团体，允许起义军通过天津。

王怀庆到了开平，伪造一份从秦皇岛登陆的民军发给王金铭、施从云的电报，要他们按兵待援；同时，他又急电袁世凯从石家庄调第三镇第十二标，于1月4日下午五时开到雷庄附近布防，并拆掉一段铁轨。这时，其他各地配合起义的部队，被袁世凯的爪牙监视，不能自由行动。冯玉祥在海阳镇也被拘禁起来了。

王金铭、施从云原计划起义军于1月3日直取天津，因误信伪电而等待秦皇岛的登陆民军，迟未出发，直到4日才明白是中了敌

人缓兵之计，乃于当天誓师出发。下午五时准备登车之际，忽然捕获了张建功派向王怀庆密报军情的奸细。张图穷匕见，率领第三营官兵踞城顽抗，与第一、第二营展开激战，相持两小时不下。王金铭

想下令猛攻张部，施从云说：“建功无能为也，若必攻之，旷日持久，海阳军及关外民军方盛，业已约定劲旅直趋天津，会攻北京，大事可立就也。”王、施决定放弃滦州，率第一、二营官兵约七百余人登车出发。晚十二时许，火车开到雷庄附近突然脱轨，并遭到炮火袭击，王、施指挥官兵下车奋勇杀敌。然而敌人炮火猛烈，且众寡悬殊，势难支撑。司书暨胜耻和焉弁龚某劝施从云换掉衣服，往东后撤，施说：“见危授命，古训昭然，予自从军之日，即思以死报国，死得其所幸也，已矣毋复言！”依然奋勇督战，与敌军血战数小时。此时清军鸣号停战，诈称请王金铭、施从云到雷庄议和。王、施应允，众官兵请阻，谓王怀庆诡计多端，恐遭毒手，王、施认为：“如果和议能成，双方免受无谓的牺牲，一直可攻京津，如出意外，以身殉志，求仁得仁，有何憾焉。”遂率领一百多官兵前往，到了雷庄，即全部被伏兵包围。次日施从云即惨遭杀害，临刑时庄然挺立，大义凛然。时为1912年1月5日。

（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）

（吕乃澄）

吴 樾

吴 樾（1876—1905），字孟霞，一作孟侠，安徽桐城县人，光复会会员。幼年，他在父亲吴尔康的私塾里读书，后来父亲出外谋生，他就在家里自学，研究中国历代兴亡的道理。

1900年，义和团运动爆发，八国联军进入北京，腐败的清朝政府，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辛丑条约》。吴樾看到国事日非，悲愤交集，毅然只身北上，去寻找救国救民的道理。他在北京，找到在京师大学堂任总教习的同乡前辈吴汝纶（字甫）老先生，介绍他考入保定高等学堂。学堂里有不少爱国志士，吴樾和他们经常议论国事，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影响，开始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。

吴樾家境清寒，在学校读书时，生活十分刻苦，常常饿了就买一个馒头充饥，但学习却非常勤劳用功。

1903年（光绪二十九年），清政府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，兴办新式学堂。直隶布政司杨士骧是安徽泗县人，督办直隶的学务。吴樾和一些两江同学向士骧要求，借用两江会馆，开办两江公学。

吴樾在课余之暇，就和同学谈论国事，激发学生反清爱国的思想。教员马铸风、杨心如、金慰农、张甯岑也都倾向革命，吴樾常和他们交换阅读清朝查禁的报刊如《革命军苏报》、《中国日报》、《新民丛报》、《白话报》等。同时又和当时一些革命人士通讯，特别是得到陈独秀（当时名陈仲甫）、汪康年、潘进化的指导，革命知识更为丰富，革命意志也更加坚定。

吴樾在两江公学经常议论革命，怕年长日久被清发觉，必须另找一个适合密谈的地方，于是由汪雨田介绍认识一位严老太太。严

母 的丈夫曾任驻日使馆随员，在日本侨居几年，思想旷达，知识丰富。吴樾经常来往严家，并且教严母的女儿严无畏学习英语和历史。严母曾经问吴樾：“你将来要做什么样的人？”吴樾说：“做顶天立地之人。”吴樾和严无畏相处日久，彼此感情深笃。吴樾离开保定时，把珍藏的书报全部送给严无畏，但却不说明自己的去向。

革命，不得不天各一方。

1904年吴樾以考察北洋警察的名义到了保定，住在两江公学，和吴樾、张啸岑等交换对时局的看法，商讨革命的工作和组织，并传达陈独秀的指示，要努力唤醒广大群众，推翻腐败的清朝政府。革命工作要谨慎而不懦弱，有勇气而不急躁。

不久，赵伯先因考察北洋新军制度到了保定，看见吴樾沉着英武，胸怀大志，就和他一起到了北京，介绍给在北京编译馆工作的杨笃生（宗仁）和胡经武（瑛）。杨笃生与吴樾长谈，了解他确实是一位实干的革命者，就把自己制造的香烟罐式炸弹送给他两枚，但没有来得及告诉详细使用的方法。吴樾又把炸弹送了一枚给张啸岑，从此两人经常密商，究竟应该在什么时间，什么地点，炸什么人，以此来振唤人心，推动革命。

吴樾常说：我们革命的目标，不仅在于取得政权，最重要的还是拯溺同胞于水火之中，以免遭受亡国奴的惨痛命运。推翻清朝以后新建的政府，如果腐败，也不惜再作一次政治上的改革。一定要求将来的国家做到人尽其才，地尽其利，杜绝依赖思想，抵制外来侵略。

他主张除了荒淫无道、卖国求荣的清朝宗室、王公、大臣外，对其余各界人士都要力求团结一致，共图大业。

1905年春，吴樾写了一篇长约一万字的《意见书》，誉清后

交给张啸岑，嘱咐他说：如果我为革命死了，请你交给可以发表的人，如不能发表，就送给湖南杨笃生或安庆陈仲甫。

1905年，在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冲击下，一部分清朝皇戚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袁世凯、张之洞等，为了继续把持朝政，提出君主立宪的主张，用以抵制革命势力的发展。西太后慈禧采纳了这个建议，派戴鸿慈、端方、绍英、戴鸿慈、徐世昌五人，分赴东西各国考察宪政。吴樾得到消息，不告而辞离开保定，住在北京西城根的桐城试馆。1905年10月24日，五大臣出国的当天早晨，吴樾身穿蓝布长衫，手提小提包，头戴红缨小帽，扮作工友，在车站人丛中不断往来，认识他的人以为他是借此机会出国“勤工俭学”呢。

火车刚要开动，吴樾突然踏上火车梯登，警卫问他：“你是跟谁的？”吴樾说：“我是跟绍大人的。”绍英正好在这个车厢里，警卫走进车厢去问绍英的随从，吴樾知道事不宜迟，立即打开手提包，不幸拉开了炸弹的引线，还没有扔出去，就爆炸了。五大臣中，只有两人受了轻伤，二十九岁的吴樾却在爆炸中牺牲。

吴樾牺牲后，清政府并不知道他的姓名，于是把他的首级割下，拍成照片，沿街遊行，让人识别。过了一个月，警察拿着照片经过北京桐城试馆，被一个小女孩发现，失声惊呼，说这就是在试馆里住过的吴老爷，这样人们才知道原来是吴樾。吴樾炸五大臣身殉后，国内外报纸都当作重要新闻刊载，影响所及，遍及中外，鼓舞了许多爱国志士献身革命。陈独秀从报上得到消息，写信给张啸岑，推测这就是吴樾，并要张把吴樾的事迹告诉他。张啸岑把吴樾的遗作《意见书》寄给陈独秀，后来发表在陈独秀主编的《安徽俗话报》上，接着同盟会的机关报《民报》和上海、香港的报纸也相继转载。1912年，张啸岑向安徽都督府申请，备文拨款，由吴樾的胞弟吴

楚将吴樾的灵柩运回安庆葬在西门外烈士墓，孙中山先生还亲撰了祭文，委托孙毓筠代为祭奠。1929年张啸岑和金慰农呈准将当时安庆最繁华的街道命名为吴樾街，以志纪念。桐城人民为了纪念吴樾，办了所中学，命名为“孟侠中学”。

(安庆史话)

☆

☆

☆

吴 樾 复 妻 书

辛亥革命烈士吴樾字孟侠，清安徽桐城人。复妻书系烈士就义前，指示其妻，如何确立革命人生观，并勉其能自尊、自爱、自立、自治，以完成革命之意义。语话皆以国家民族为重，绝无儿女情长，留恋悲怆之态。烈士慷慨就义，壮烈捐躯，英烈垂天地，正气贯千秋，爱国爱民，视死如归，不愧为炎黄子孙，民族英雄。我幼读此文甚受感动，特此谨录，公诸社会，对青年一代爱国主义教育，不无影响。原文：

来书情词恳切，尚有未了之语，今特申前意。使子尽晓无余。

吾之所谓复仇者，非以子为我所有之谓也，亦非私子于我而谓我复仇也；吾之意欲子他年与吾并立铜像耳。爱子之甚，故愿子弃死而就生，以为同胞复九世之仇焉。若云报吾之恩，吾何恩之有，子又何报之有？吾期望于子者，思想日渐发达，智力日渐进步，而导以民族之主义，爱国之精神者，亦为同胞起见也。子若志不在此，

则人间之安乐富贵，自可操券而得之，以子之年华，才貌足以相当也。如曰：“拙钝无能为力。”是真不自尊；即不自爱之代名词耳。夫天下事，人能为者，我亦能为之。“舜何人也，予何人也，有为者亦若是。”子不见法国之罗兰夫人——区区弱女子，而造此惊天动地之事业。彼岂有异于人哉？无异也。其所以至此者，亦由于平日明于自由之不可失，虽此身可亡，而此名不可没，故宗旨一定，方法随之，直至达到目的而后已。

今日大地之上，人莫不曰：“产欧洲之革命者，法国也。产法国之革命者，罗兰夫人也。”何不一思享富贵乐，身歿而名不称者之为得乎？抑生则辱，死则荣。不惟己之牺牲，而为同胞活命之为得也？孰得孰失，子自裁之可耳。

“身不屈己”一语，尤觉太自尊！太不自爱。夫自尊者，未有不自立，自立者，未有不自治。以自立自治之身，而犹曰：“此身之主权不属我。”则未之闻耳。夫人至以身而得主权，必其不能自立自治而具有依赖性者也。我国此性特深，自不当独怪子，吾于是益恨异于专制之流毒，而使我同胞几无一人能自由矣。子无事时，可扪心自问，叩此身之果异于己与否，不足语此。譬如人有夺己之钱财者，己必夺而还之方安也。钱财为身外之物，己尚不忍弃之。而视此身外之主权，乃不钱财若乎？噫！异矣。

至谓：“前此之光阴虚度，罔生于世，无味之至。”是则有进步之言也。夫往者不可谏，来者犹可追”。欲求生不虚生，请自今始。

以上云云，度未必能适子听，亦以子在今日，尚不过为文明之起点耳。谨将此书留之异日，以证将来进退，何如？某顿首

秋瑾与吴芝瑛

山石

吴芝瑛女士，晚清桐城派文学家吴汝纶的侄女，廉南泉的夫人，在清季闺秀中颇有文名。秋宗章在《六六私乘》中说，吴芝瑛“于时人少所许可，邂逅论交，独倾倒于姊（指秋瑾）”。其后两人乃有金石之盟。秋瑾在《赠盟姊吴芝瑛》诗中有句云：“芝兰气味心心印，金石襟怀默默谐。”可见她俩交谊之深。秋瑾被杀后十日，吴芝瑛在清廷欲兴大狱的恐怖气氛中写了《秋女士传》，未几，又写了《记秋女侠遗事》，为后人留下了有关鉴湖女侠的重要史料。文中记述她曾宴请秋瑾，酒罢，“女士拔刀起舞，唱日本歌数章……歌声悲壮动人。”这样描绘女侠的形象，在清末的有关记载中是仅见的。这多少也反映了吴的胆识与为人。

这里且不说吴与徐自华冒绝大风险为秋瑾营葬的事，单单回顾一下秋瑾死后，吴芝瑛所写的若干有关诗文，也会使人倾折于她对死者的情谊之深了。秋瑾生时，吴芝瑛曾书赠一联：“英雄尚毅力；志士多苦心。”这说明她对女侠的革命志趣是有所认识的。女侠殉难后一年，即一九〇八年（戊申），吴又写了《戊申花朝西冷吊鉴湖四首》，有“今日西冷畔一恸，不堪重唱《宝刀歌》”之句。《宝刀歌》是秋瑾手写的长诗。

秋瑾之墓，原由吴芝瑛与徐自华推故人之谊，按秋瑾生前之托，营建于杭州西湖之西冷桥畔。不久，满御史常徵上奏清廷欲平其墓。吴芝瑛闻知，写了《无题》二绝，其中说：“莫向西冷桥上望，更无风雨亦愁人。”道出了她的无限悲愤。她又在《哀山阴》中写道：“秋风秋雨山阴道，太息难为后死人。”由此可知，她在女侠死难后，常以负起“后死人”的职务来勉励自己。

当然，吴芝瑛与秋瑾尽管情同手足，政治思想上的见解显然并不一致。对于秋瑾的激进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，吴也未必完全赞同。吴只是当年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同情者。但象近来电影《秋瑾》中对吴芝瑛的某些描写，说她力劝秋瑾停办《中国女报》，劝秋瑾提倡“女子国民捐”为清廷弥补亏欠，这样的刻划，从现存的有关史料看也是缺乏事实根据的。……

（团结报 1984年3月3日）

· 11 ·

先公马冀平传略

先君马振宪，字冀平，号寄翁，亦字无寄，桐城人。清朝光绪二年（公元1876年）六月十三日生。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年），江南乡试举人，二十九年会试第二十三名，殿试第三甲七十三名，赐进士出身，朝考一等，点翰林院庶吉士。三十三年（1907年），进士馆法政大学最优等毕业，授职检讨，充国史馆协修官，编书处协修官，法律馆纂修官。时慈禧太后垂廉听政，曾被派赴日本考察政治，回国后，著有考察纪实（洋装一原册并附列有日本工农业情况表格）约数十万言出版问世。因与慈禧政见不合未委以重任，仍在翰林院任编修之职。宣统三年（1911年）授弘文馆一等秘书官。民国二年（1913年）曾任京师地方审判厅推事及兼任安徽审判厅厅长。当许世英任交通部总长时，任京津铁路段长。民国十一年（1922年）简任安徽财政厅长，十二年（1923年）调任安徽特派交涉员，兼任芜湖关监督，后又调往北京，任国务院参议，后卒于北京。

先君任芜湖关监督时，那年我才十二岁，随着母亲到先君的官邸。这是我父女第一次朝夕相处的宝贵时光，也是我领受父亲最后一次教导。因他长年旅居北京。先君气宇轩昂，目光炯炯，沉默寡言，不怒而威。外祖母马太夫人常说，她一生所见之人不少，可曾没有像见自己的女婿时那样局促不安。父亲生活俭朴，布衣粗食，平生信佛，不茹荤腥，公余常诵经礼佛，打坐参禅。曾请谛闲法师在芜湖赭山广济寺讲法华经数月，前来听经的善男信女不下千人。七月三十日是莲菩萨的生日，那天晚上在镜湖放莲花灯千余盏，莲花在水中飘荡，鲜艳夺目的光焰照射四岸，恍若神仙世界。千万市民扶

老携幼齐来观赏。这莲花灯的含义当时我全不了解，只留下一个深刻难忘的印象。一天，先父给我一本赵文敏的字帖，教我学习书法，规定每日要写十张，并在那字帖上用无锋秃笔写了一篇训示，墨如点漆，光泽可鉴。虽事隔数十年，犹楚楚在目（在那三伏炎天直写得我汗流浹背，手腕发麻）。又曾记父亲常埋怨母亲不该将有限的**校资**，购卖田地，靠收租度日，将来定受苦不浅。直到解放前夕，先母还常提父亲的这句话。我在芜湖只住了半年多，母亲便急着要回桐城。因她老人家生性淡泊，不惯于官场应酬。从此一别再也没有见到父亲的一面了。

先君任安徽省财政厅长时，在迎江寺左侧修建一所大士阁，规模壮丽。进门是一道斜坡，循坡上去，步步莲花。从右手耳门进去，里面是雕梁画栋，曲榭迴廊。正殿供奉白衣大士观世音菩萨。凭栏可眺望江上烟波和江南景色。八十多年来，千千万万游人和诗人墨客，谁也不知道这座富丽堂皇的殿阁，是先君出资修建的。因先父当时不愿立碑纪实，传名后世，只是虚心事佛而已。同时将准备建造自己住宅的数千金，悉数赈济淮河两岸的灾民。在任高等审判厅长时，见安庆对江海口州百姓穷苦，便和姚觉武、徐平轩等集资开垦，变荒洲为绿洲，使人民生活有所改善。

曾听通州范姑父（肯堂）说，先父在西湖灵隐寺附近建造一所别墅，但他从未告知家里人。我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时，曾游西湖两次，特到灵隐寺去访问，却无从知道先君别墅在何处。后听三伯父说早捐给中国佛教会了。民国十四年（1925年），先君由芜湖返京，即任国务院参议兼中国佛教会长和红万字会理事长。当时有志开发中国边疆，振兴实业，便在天津和李善人等创办殖边银行和实业银行。民国十五年（1926年）春，不幸传染瘟疫，卧床十日，

于三月初十日长辞人世，享年五十一岁。著有《世曼克室诗集》四册。诗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焚毁。先父诗，学黄山谷，后自成一格，善七言古体，诗中多吟咏名山、烟景和古寺禅林。

先祖父 恒公原任海军总管务处翼长，曾在旅顺与丁汝昌将军训练海军，不幸中风归里，那时家道清寒，先君未第时，曾于城隍庙设帐授徒，自入赘于方鞠裳公为婿，即连科高中。因此，我兄妹皆寄养于外家。当噩耗传来，有如晴天霹雳，舅父方公仲_紫，即携兄北上奔丧，协同三伯父料理后事。先君为官清廉，又好布施，以致身后萧条，他所用的那具棺材，还是段祺瑞赠送的。当时京中各大寺院名德法师，皆自动前来南池子寓所为诵经超度，终日香烟缭绕，灯烛辉煌，钟磬木鱼之声，日夜不绝。

先君昆季三人，长兄振代，字彦恂，清朝进士，历任江西吉安知县和总统徐世昌的秘书。次兄振理，字叔文，前清举人，历任福建知县。著有《诗经本事》近百万言（上海世界书局出版）。姊一人，适南通范彦殊（是中国著名诗人范肯堂之子）。子慧正，不幸早夭，遗孤同，侨居德国，孙女伽伽现居台湾。女华正适潜山程仁乡。

华正年已衰迈，撰先君事略，不禁哀思万端。而学无所成，真愧对先人，即所写事略，亦不能表达先君之德于万一，只能记其梗概而已。

不孝女 马 华 正 谨述